

七日談

(北京篇)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新大眾文藝」的發展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中「二〇二六年政府工作任務」的部分。而在這次「兩會」上討論的《「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這部關係到國家未來五年發展的重要文件中，更從多個方面把相關的領域作為文化方面的增長點。在關於文化的總共三個部分中，都涉及了「新大眾文藝」的相關內容。在「大力繁榮文化事業」部分寫入了「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在「加快發展文化產業」部分提出：「改造提升傳統文化業態，推進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動文化建設數智化賦能，信息化轉型，發展數字動漫、沉浸式展演、短視頻、微短劇等新型文化業態，引導規範網絡文學、網絡遊戲、網絡視聽等健康發展。」尤其是高度關注新的文化業態的發展對於社會的作用。同時在「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部分，也提出了「推動網絡文學、網絡遊戲、影視動漫、精品展覽等出海」。可以說，「新大眾文藝」的相關領域已經成為文化未來發展的重要領域，它已經成為國家發展在文化方面的一個重點。

「新大眾文藝」近年來迅速發展，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領域，現在已經形成了相當可觀的規模和影響力。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轉型持續深化，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年輕一代成為文化消費與文化創造的主力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從物質層面延伸到精神文化領域。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和各種技術在文化中的運用也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支撐。這些深刻變化，為文化發展開闢了前所未有的

「新大眾文藝」融入國家發展

張頤武

廣闊空間，也讓互聯網條件下的「新大眾文藝」，從蓬勃生長的新業態，躍升為支撐文化強國的重要方面。這深刻改變了文藝創作的生產方式和傳播路徑。這些變化無論在國內國際都有重要的影響。從社會層面來看，「新大眾文藝」的發展契合了當下公眾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變化。人們對文化消費的期待有了很大的轉變。單純的接受已經被多樣的參與所替代，人們追求更加個性化、互動性強的體驗，更注重作品用新的適應互聯網發展的形式創新地表現當下的生活形態。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着文化的未來走向。

「新大眾文藝」發展的成就引人矚目。網絡文學經過二十餘年的積累，已經擁有數以億計的讀者群體，每年新增作品數量達到數百萬部，類型極為豐富，已經成為極為重要的文學形態，不僅滿足了讀者多樣化的閱讀需求，更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原創IP，影響巨大。網絡視聽領域同樣發展迅猛，直播等線上演播發展迅猛，短視頻平台日活躍用戶數以億計，微短劇在近兩年更是呈現爆發式增長，單部作品的播放量動輒破億，製作水準和敘事能力也在快速提升。網絡遊戲的產業規模持續擴大，國產遊戲在技術和藝術表現上不斷突破，多款產品成功進入全球市場，成為文化輸出的重要載體。網絡文學、網絡遊戲、網絡視聽等都已經成為海外年輕群體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其國際傳播價值日益凸顯。

「新大眾文藝」展現出多方面的「新」的形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首先是創作和接受「新」：創作者和接受者都有變化。創作者既有專業群體，也有普通網民、青年學生、基層

創作者、素人博主等等。接受者也更為廣闊。全民共創共享的新形態形成。其次是平台和技術「新」：互聯網與AI不僅是載體，更是創作底座，生產、分發、消費、變現全鏈路數字化。再次是格局和形態「新」：從國內走向全球，從單一文本走向IP全產業鏈開發，從文藝作品走向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國特色、世界影響的新文藝生態。應該可以看到，當下「新大眾文藝」處在高速增長步入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期，活力充沛、形態豐富，出海亮眼，但也面臨內容同質化、思想深度不足、精品供給不充分等問題。向精品化邁進，也需要價值引領與審美提升，避免流量至上、過度娛樂化；更需要更強原創能力與敘事功力，從模式化套路走向獨特表達；同時需要體系化支撐，包括平台建構、版權保護、評論引導、人才培養、評價標準的同步完善。

這次「新大眾文藝」被納入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體現了對其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的高度認可，標誌着其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一領域的發展，關係到文化強國建設的整體布局，關係到中華文化在全球傳播中的競爭力，也關係到億萬民眾精神文化生活的質量提升。政策層面的明確導向，既是對既有發展成果的肯定，也為未來的規範發展提供了制度支持保障，也對於未來的發展有了更多期許。值得注意的是，在鼓勵支持發展的同時，也有引導規範的提示，這意味着在釋放創新活力的同時，



▲三月七日，身着古裝的遊客在江蘇省南京市朝天宮景區與玉蘭花合影。 新華社

需要建立健全機制，確保新大眾文藝在健康的軌道上持續前行。此外，推動相關業態「出海」的部署，凸顯這些新的品類的「出海」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也體現了以數字文化產品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戰略考量。

展望未來，「新大眾文藝」將在技術演化迭代與政策引導支持的雙重驅動力下，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和公眾的全面參與下，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虛擬現實沉浸式體驗等新技術的應用，可能進一步重塑文藝創作的面貌；而創作者群體的持續擴大、作品質量的穩步提升，也將推動這一領域從規模擴張向內涵深化轉變。作為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新大眾文藝」不僅承載着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更肩負着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使命，其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馬與馬肉



自由談
王成偉

馬年，朋友圈裏、新年祝福裏，處處都是馬。看到上海有作家朋友聊起馬肉，就想起幾年前，人生首次品嚐馬肉的事兒。

那還是疫情前夕，在內蒙古草原工作的家鄉髮小給我寄了一大堆馬腸馬肉。分了一些給幾家好友，大家都面面相覷不知道如何烹飪。我的操作簡單，一律入鍋蒸，最能保持食材本味。寄來的馬肉臘腸，模樣和豬肉臘腸差不多，只是更粗一些，色澤鮮紅，煙熏過，完全聞不出類似於羊肉的任何膻味。切片清蒸後更顯柔軟，脂肪含量也比豬肉少很多，口感相當不錯。記得河北秦皇島人善食驢肉火燒，說驢肉是「天下至尊」，堪比龍肉。龍肉沒人吃過，但我以為馬肉更勝一籌，尤其適合下酒。記得疫情期間，有些天買不到蔬菜，就蒸盤馬腸馬肉來三兩白酒。後來想買一些，可惜當時沒記下生產廠家的聯繫電話。不好意思問髮小要電話，怕他又寄一大堆還不肯收錢。日後他去了非洲謀生，聯繫減少，就更不再叨擾了。

這位髮小比我略大幾歲，是湖北家鄉同村人。他家有棵很大的杏樹，小時候他靈活得像隻猴子，常爬上樹梢搖一地熟透的黃杏，落在草叢裏。他一個一個撿起來，每次都把我的衣兜塞得鼓鼓的。我家沒牛，最開心的是央求母親放行，許我和他上坡放牛。尋幾塊又薄又長的乾淨石塊，在山坡上避風處，搭個簡易的土灶，烤紅薯片吃，能玩大半天。牛在旁邊悠閒吃草，也不跑遠。尤其羨慕他可以自如地騎在牛背上睡覺，他的牛總是那麼溫順敦厚通人性，從不捨得把小主人摔下來。我卻不敢嘗試一次，成了終生憾事。如今人到中年了，大家只能四海為家各自奔波，極難見面，小村也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裏，沉沒於江底十多年。

上海作家何菲在一篇關於馬肉的美文中說，切割馬肉時，馬肉一旦接觸空氣就會變成櫻花色，而恰巧在櫻花盛開的時節，馬肉刺身最為肥美。聽來很唯美，沒見過切割馬肉，但我之前吃到的熏馬腸馬肉的鮮紅，確實接近於櫻紅。海鮮刺身常見，卻不知道這世上還有馬肉刺身，更不知道上海也有，真是大開眼界了。不過也沒想着擇日去吃，吃任何特別的東西都需要有特別的人同行，才別有一番不尋常的滋味。何菲老師是慈悲善良的優雅女士，吃馬肉有心理障礙。我生於中原，定居江南，但靈魂裏卻是蒙古大漢，吃馬肉毫無壓力，若能在星空之下的草原上吃手把肉跳篝火舞，該是何等豪壯奔放。可我也懂何菲女士，因為我對吃兔肉有心理障礙。我兒子生於兔年，出生時我特地戒了一個多月葷，日後也盡量遠離兔肉了。

突然想起兩匹馬。最早看見一匹活生生的馬從眼前走過，是十幾年前在浙江溫州市區。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全是車，有人牽了一匹高頭大馬，習以為常地輕輕走過，像走過一片草原。除了動物園裏，我已經很多年沒看過馬了。驚嘆牠就這樣被人牽引着，旁若無人地行走在人世間，坦然從容，個個俊逸，像靈魂裏我們渴慕已久的自由。那一天，我不由自主地尾隨着他前行了很長一段路。

另外一匹，還是在溫州。雁蕩山有個開民宿做茶的朋友，這幾年養了一匹大黑馬，名為「小黑」，天天在他朋友圈的山路上噠噠噠地跑，我時常關注、點讚。前幾天還看他把盤子裏的西紅柿、蔬菜夾給小黑吃，親密得像他兄弟。小時候看影視劇裏騎馬馳騁的颯爽英姿已經很羨慕了，養馬更是不敢想的奢侈。所有敢為夢想付諸行動活出色彩的人，總是值得敬佩的。十年前，我為雁蕩山策劃過一場大型活動，他是品牌贊助商之一，我帶着一幫影視導演、演員、主持人入住他的民宿，吃他親手烹飪的溫州美食，喝他親釀的苞穀酒。之後，竟然就沒機緣再去過了。一直心心念念想再去，去年問，他的民宿已沒開了，專心種茶、養馬。不知道今年有沒有機會去雁蕩山，看看老朋友和他的馬。



流動空間
方元

在香港醫學博物館，有一張一百多年前的醫學博士文憑——但它並非香港本地醫學院的文憑。那麼，它為何在香港的博物館展出？

我們知道，中國的西醫教育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廣東作為中國最早對西方國家開放的地區，在西醫教育方面自然起步得早，例如一八六六年成立的廣州博濟醫學堂和一八八七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學院。對於有志學醫的粵東子弟，這兩間學校是近水樓台。

然而，醫學博物館的這張文憑不同尋常：它發給一位香港的醫生，名叫尹端模，但頒發文憑的學校不在廣州，也不在香港，而是在兩千四百多公里之外，名叫「天津海軍醫學校」。

這是一張全部以英文書寫的文憑，簽發的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在正文的下方有一句註釋：「此證書發給尹端模博士，他於一八八八年在本校畢業，因原文憑遺失而補發此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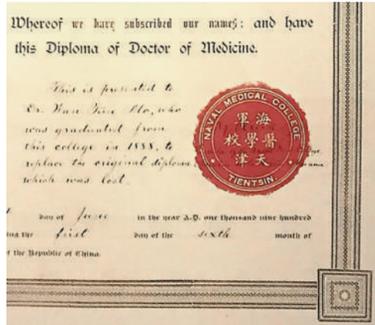
雖然這回答了為何這張文憑出現在香港，但引出另一個疑問：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天津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遙遠的地方，乘輪船走海路長達十天左右，為何一個香港人不辭海上顛簸，千里迢迢去天津學醫？

要想解開這個謎，便要弄清楚那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天津海軍醫學校的前身是北洋醫學院，而北洋醫學院的前身是天津醫學院。它曾是中國最著名的一所醫科學校，培養了中國第一代西醫人才。

一八八〇年末，直隸總督李鴻章在英國醫生馬根濟(John Kenneth Mackenzie)的建議和協助下，創立了天津總督醫院。翌年，醫院增設了附屬學校。這種學校與醫院結合的體制是搬用英國當時的做法。學校的正式名稱是「天津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院」，而「天津醫學院」是常用的簡稱。

此後，隨着學校的發展變化，校名至少更改過三次。一八九三年末，醫學院與總督醫院分家，改名為「北洋醫學堂」，併入新成立的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中華民國成立後，學校於一九一二年劃歸教育部，改稱「北洋醫學

一紙文憑 百年傳奇



▲在尹端模的醫學博士證書上可見天津海軍醫學校的官印。 作者攝

校」，又於一九一五年由海軍部接管，改稱「天津海軍醫學校」，直到一九三〇年停辦。

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是為了強調天津醫學院的兩個重要特點。第一個特點：它是「官立」學校，而且是當時(十九世紀)中國唯一的官立醫科學校。同時期的其他醫科學校都是私立的、教會辦的學校，例如廣州博濟醫學堂和香港華人西醫學院。實際上，天津醫學院有兩個第一：中國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醫科學校，中國第一所軍醫學校。學校成立的初衷和目的是為海軍提供隨軍醫生。從天津醫學院到北洋醫學院，再到最後的海軍醫學校，它始終是軍醫的搖籃。

由於它是官校、軍校，因此學生免繳學費，並由學校提供食宿和生活費。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到海軍醫院或軍艦上做「醫官」。優秀者可獲得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顯然，入讀這樣的名校，人生將有大好前途。這就不難理解香港學子為何不遠千里，北上求學。

一八八四年尹端模赴津升學時，香港華人西醫學院尚未成立，全國尚無一所大學。所以，天津醫學院是升學的上佳之選。那一年，香港中央書院有十二名學生考入天津醫學院，包攬了那年招生的全部名額。

那麼，天津醫學院為何不在京津地區就近招生，而要千里迢迢去香港招生？這就說到第二個特點：學校是全盤英式教學——教師是英美籍的醫生，教材是英文，在課堂上課和醫院實習都要講英語。由此可見，學生必須具備充足的英語實力才能完成學業。因為當時香港

學生的英語水平被認為高於其他省市的人，所以學校特地遠赴香港招生。

即使以今日的眼光看，天津醫學院的辦學模式也是很進取的。這相當於把一所英國學校辦在中國。它的出現是清末「洋務運動」的結果。在遭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後，奕訢、李鴻章等「洋務派」領袖意識到現代化的迫切性，於是向船堅炮利的西方國家學習，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天津醫學院即是李鴻章以英國為師，組建海軍時的一個「副產品」。為了盡快地掌握西方的科學技術，盡快地培養出本國的醫學人才，唯有全盤引進英國的教育模式。軍醫制度亦是由此開始。然而，清王朝的衰亡不是幾艘鐵甲巡洋艦和幾所英式學校能挽救的。

在這段歷史中我發現一個事實：香港人因英語好而獲得先機，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接受正規西醫教育的人。在天津醫學院首屆學生中，第一屆招收的八人全部是留美歸國的學童，第二和第三屆招收的十六人全部來自香港。在這批香港學生中，有的成為醫學界領袖，例如屈永秋和徐華清，前者曾任北洋醫學院的總辦和天津衛生總局的首任總辦，後者是北洋醫學院的首任總辦和北洋防疫醫院的創辦人；有的則成為赫赫名醫，例如麥廷堅和關景賢，他們曾任太醫院的御醫。

尹端模的道路與那些走上仕途的同學不同。他沒有留在京津，而是回到粵港發展。關於他的生平事跡，散見於香港和內地多家媒體，不在此贅述。讓我好奇的是，補發那張文憑時，尹端模離開天津已三十三年，母校還記得他嗎？我查了一下校史資料，發現當時的校長名叫經亨成，是天津醫學院的第四屆學員，而尹端模是第三屆，因此他們很可能互相認識。尹端模收到補發的證書時，已是知天命之年，功成名就，因此這張證書肯定不是用來找工作。

一紙文憑為我們打開百年傳奇之窗。透過它，我們看到天津在近代西醫教育史上的重要位置，看到香港人在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獨特角色……它也是反思歷史的鏡子：為何一所贏在起跑線上的名校卻在半途中倒下？香港人如何在今日的國家建設中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獨特角色？



黃花風鈴木 競相綻放



市井萬象

近日，廣西南寧青秀山黃花風鈴木園的黃花風鈴木競相綻放，如同金色浪潮，吸引遊人專程前來踏春賞花。

中新社